

水煎包：味蕾上的曹州风情



水煎包盛行于全国各地,特别是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广东等地最为常见。具体到山东,则以“曹州水煎包”为最,名列全国十大水煎包之首。它历史悠久,制作讲究,工艺精细,风味独特。据多个专家和学者的考查,“曹州水煎包”应起源于汉代,流行于唐宋,盛名于明清,具有较高的知名度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秦末汉初,相传与汉高祖刘邦少时逃难的故事相关。

那是秦朝末年,由于朝廷暴政,苛捐杂税,加之劳役,民众不堪重负,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某年秋末,黄淮地区又遭天灾和兵乱。一日,秦军到沛郡丰邑来抓丁,为避秦兵,刘邦与母亲逃离家乡,一路风霜来到曹州。这天,已是黄昏时分,母子二人疲惫不堪,又饥又饿。偶遇一家蒸包店正要关门,急忙走上前去,欲讨口饭吃。店主见人二人可怜,把他们接进了店里,把剩下的面和碎菜包了几个包子,在锅里放点油、加些水去煎,不一会就做熟了。母子二人饥不择食,很快吃了下去,才千恩万谢而别。后来,刘邦登基做了皇帝,母亲对那顿在曹州逃难时吃的包子,总是念念不忘。于是刘邦下诏,把曹州包子店的主人召到长安,在宫内作了御厨,专门按原来方法给母亲煎包子吃,圆了母亲的心愿。有人说,这就是水煎包的雏形。

说到“曹州水煎包”兴盛于明清时期,因为当时的曹州已是鲁西南重镇,商贸云集,店铺林立,水煎包也成为当地的美食。据说,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也曾来曹州吃过水煎包,并且盛赞不已。

那是清康熙年间,蒲松龄在济南参加乡试,未第。无心在泉城逗留,便伙同一起参加会考的曹州秀才张智,前来曹州观赏牡丹。来到曹州第二天,张智就带蒲松龄去了曹州赵氏园。观花后,又去拜见花师赵玉魁。赵玉魁在家里热心款待,特意在“西门里”买来了“曹州水煎包”。当蒲松龄吃到包子时,就盛赞不已,说:“口味太美了,这曹州水煎包可与曹州牡丹齐名。”饭后,赵玉魁又给蒲松龄讲述了牡丹仙子的传说,蒲公听后更是惊喜,说:“这牡丹仙子的故事和曹州水煎包的味道一样美。”后来在《聊斋志异》中,也就记下了“葛巾”这一名篇。

曹州老城中“西门里”的水煎包,今日还是许多菏泽人难以忘怀的美味。即使距离比较远的

食客,也愿意为这一口美味前来品尝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制作,设施比较简单,主要用具有面盆、馅盆、案板、平底锅,还有香油壶、面水瓢、长条铲等。平底锅上多用尖顶盖,以往是用麦秸秆编制的锥形盖子,人们习惯称其为“锅帽子”。可现在,商户多用的是金属锅帽子。具体到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制作工艺,与外地的水煎包大不相同,特别是与外地的“生煎”更是不同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制作过程相当讲究,工艺要求十分严格。第一阶段是“准备”:首先是“发面”。将面粉、酵母、少量白糖,加水揉成软面团,发酵50分钟,直到面团膨胀。然后是“调馅”,将五花肉打成肉泥,将蔬菜剁碎拧干,再加入葱姜末、油、盐、调料等搅拌均匀,调和成黏稠状,静置一下待用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常见的馅料,有荤素两种:一是肉馅,最常见的有羊肉馅的,有猪肉馅的。二是素馅,最常见的有韭菜鸡蛋的,也有胡萝卜粉条的,个别店铺还有其他馅料的。用的食油一定是芝麻油,菏泽人习惯称其为“香油”。用的佐料都是自己加工的,配料都有自家的诀窍,因此不同的店铺的口味也不尽相同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制作,第二阶段是“包制”。首先“擀面”,将发面分成小面团,揉圆按扁,再擀成圆皮。然后“包馅”,就是在面皮中间放入馅料,最后捏合在一起即可。很多店铺为了区别不同馅料的包子,而作成不同的形状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制作,第三阶段是“煎制”,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关键一步。加火前,首先把平底锅上“刷油”(多用豆油),防止粘锅。然后,把包好的包子摆放在锅里,烧火加热。略煎一定程度后,再倒人勾兑好的面浆,面浆的稀稠要靠店家去掌握,太稀外皮不焦,太稠容易糊锅。然后盖上锅盖,“焖蒸”上一段时间。

等待一定程度后,打开锅盖,迅速在包子的隙间“淋油”,就是用油壶一圈一圈,从外到里,淋入香油。这是“曹州水煎包”的关键一步工艺,所以,又有人称其为香油水煎包。待包子下面结痂后,要用长锅铲全部“翻面”。然后靠锅膛的余热去“烘烤”,完成出锅前的最后一道工序。其实整个过程,就是一个半煎半蒸的过程,这也是“曹州水煎包”区别于外地煎包的不同技艺。

煎好的包子,色泽黄里透红,一面焦脆,三面软嫩,其脆而不硬,软而不腻。“曹州水煎包”的特征,是底面附着外皮带有裙边,人称其为“烙馍”,薄得几乎透明,又焦又脆。吃包子的时候,人们往往都是先把烙馍吃掉。然后,再咬上一口,馅料鲜美,香味浓郁。一下子沁人心脾,口感上佳,就像曹州人的那种豪爽劲,干净利落,热情洋溢,回味无穷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早已是鲁西南地区的传统名吃,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菏泽人谁能吃上它,那是一种生活上的享受,也是家庭富裕的象征。可今日,“曹州水煎包”已经属于大众风味的小吃,在街旁店铺、路边摊点,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

“曹州水煎包”不仅仅是一种美食,还形成了当地的一种文化象征和符号,这其中承载着诸多菏泽人的情感和记忆。旅居台湾、荣获2012年“感动中国人物”的高秉涵,客居他乡70余年,每次接受采访或回家探亲时,总是不时地提起“曹州水煎包”,这里就蕴含着他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。

在今日曹州老城的街上,有一家“白家水煎包”,据第四代传承人白毅的介绍,白家的水煎包已有百年的历史。其中的“羊肉水煎包”,属于“全国水煎包十大名吃”之一,还在中央电视台上作过介绍和报道。白毅还说,在采访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,“这是菏泽的老味道”。邓文献(请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)

蓝知县审石碓

蓝瑞,明朝正德、嘉靖、隆庆年间人,字理同,号信庵、稀庵,世称稀庵先生,曹县沛郡里蓝楼村(今砖庙镇十三村)人。嘉靖戊子年中举后,先选河南鹿邑知县,后任山西乐平知县。在鹿邑任上,因执法严峻,政声显著,被县民称为“蓝青天”。在乐平任上,更是体察民间疾苦,减轻民众负担,深受乐平百姓的爱戴。在乐平,至今仍流传着蓝知县审石碓巧断盗布案的故事。

话说一日早堂,蓝知县升座,见三位客商模样的人慌张地闯入大堂,声称所贩棉布夜间被盗,恳望知县大老爷派员查案缉盗,为其挽回损失。

蓝知县详细询问了三人失盗经过,并得知客商乃山东曹邑人后,便暗下决心,一定尽快侦破此案,严惩不法之徒,为家乡百姓挽回损失。

原来,三位曹邑布商想贩卖棉布到乐平出售。来到乐平,天色已晚,为防不测,他们三人找了一个打粮的当场,将所贩棉布紧靠在当地的石碓边上,三个人围着石碓而眠。可由于长途跋涉,劳累过度,躺下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。结果醒来一看,布匹不翼而飞。

蓝知县了解布匹被盗的经过后,深思熟虑,计上心来。第二天一大早,蓝知县忙让衙役张出告示,要公开审理山东客商棉布失盗案,被告人就是场中石碓。同时,大量收购民间棉布,以备石碓不肯招供时动刑使用。

消息传开,四面八方的百姓都云集布布的场里,想亲眼看看县太爷怎样审问石碓。

审问开始,蓝知县走近石碓,令其将盗布经过如实招来。可石碓毕竟不会开口讲话,更不会招供。于是,蓝知县命衙役施以杖刑,石碓依旧不语。蓝知县佯装大怒,遂令衙役迅速取收来的棉布,将石碓层层裹紧,以火焚之,看其招是不招。

一匹匹棉布被先后取开。突然一匹布中间出现了个红绒线绣成的“赵”字,继续下去,又发现了绣有“李”“王”字样的几匹棉布。正在人们不解之时,蓝知县立命衙役,速将妄布之人捉拿归案。

原来,盗布贼正为赃物怎么出手犯难,猛听到县太爷张贴收购棉布的告示,并说要收购的布匹焚烧。这是发财销赃两不误的买卖,于是窃贼便高高兴兴地把所盗棉布全部卖给了县衙。而三位曹邑布商分别姓赵、李、王,他们为防不测,出行之前,便在布匹之内留下了自己的姓氏。此事蓝知县已经问明,盗贼并不知晓,棉布扯开之后,岂不真相大白?物证确凿,盗贼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认罪伏法。

从此以后,乐平地界的土匪盗贼不敢妄为,就连乐平的地痞流氓也收敛起来。乐平大治,“蓝青天”的称呼更是传播开来。

丰瀚 鄧鴻



儿歌曰:槐木耙,砸钎钉,爷爷耙地在家东;大黄牛,鼻子宽,一天耙地十亩三;牛缰套,粗又长,慢走慢行不用忙;皮鞭子,响声脆,拉耙一天可真累。种地讲究精耕细作,深犁后,需要三遍五遍地耙,将地弄平整匀实了,再下种。

以前,鲁西南地区,耙地都用牲口,套上牛、马,把式拿着鞭子,牵着缰绳,驾驭着,在坷垃地里来回走。

耙都是槐木、榆木等木质较为坚硬的材料做的,梯形,长约两米,尺寸有大有小,不十分规整。耙钎子都是铁打的,又尖又长,放在地里抓地,耙得深。

为增加分量,耙上一般要站个人,大人或者孩子,牲口力量强的话,把式就站在上面。力量弱些的,就蹲个孩子。也有将粪箕子盛满土坷垃放在耙

上的,不过到地头拾耙脚时,要抬上抬下,很麻烦。

所谓耙脚,就是耙地过程中,耙钎会将犁地时埋在地下的枯草、庄稼枯根等杂物勾上来,聚得多了,影响耙地深度,因此,耙地来回一趟两趟的,就要在地头将耙掀起来,拾耙脚。

地里杂物多的话,就不要等到地头再拾耙脚,把式要随时看着,根据耙钎留下的划痕深浅,就能判断耙脚多少,根据情况,随时叫停牲口。

耙地如绣花,讲究的是个美。一般情况下,耙地须四遍,第一遍直行,二遍斜行,三遍横行,第四遍又直行。最后,围地边缘行一周,谓之收边。

四遍耙完,地便被整得土细松软,条纹优美好看,一场透雨之后,便可适时播种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古邑“三绝” 民间“佳话”

从古至今,众口相传,“张家牌坊、李家匾、王家大旗杆”被称为“单县三绝”,是当时的单县文化标志。

单县原有牌坊百座,享有“牌坊城”之誉。“文革”中,绝大多数牌坊遭损毁,仅剩百狮坊、百寿坊,皆为贞节牌坊。

百狮坊俗称张家牌坊,现位于单县老城区牌坊文化广场。《单县志》记载,百狮坊建于1778年,由县令为文林郎张蒲之守节之妻朱氏而敕造。

百狮坊为全石结构,高14米、宽9米,四柱三间五楼式,正间单檐、次间重檐、歇山顶、斗拱交错,棱角起翘,通体雕刻,八根夹柱分八组雕刻百个狮子,大狮子巨头卷毛突目、隆鼻阔口利齿,巍然蹲踞,矫捷威猛。每个大狮子身上攀伏着五个小狮子,姿态各异,相貌迥然,或挠痒自娱,或舔舐抚铃,或摇头摆尾……狮座前左右三面浮雕圆形松狮图,幼狮三三两两,蹦蹦跳跳,争戏绣球,可谓“巧夺天工、天下无双”。

明朝年间,单县古城的东关街居住李姓富家,其子嗣昆仲二人同榜考中进士,传为美谈。

是时,秉性刚直、才华横溢的大书法家雷铤触怒权贵,弃官流落民间,穷困潦倒,辗转至单县,在城南黄岗岗市一小茶馆当伙计,求字者接踵,而获得者极少。

李家兄弟同榜提名,光宗耀祖,自视甚高,卓尔不群,遂特请雷铤书匾称誉传后。当即,雷铤不惜墨宝,欣然书写“进士”二字,其笔力刚劲雄浑、洒脱奔放,可谓“一字千金、传家之宝”。

李家大门同时挂起两块进士匾,实为罕见,轰动全城,李家匾随之闻名遐迩。

明朝时期,单县城郭东门外王家官居巡按,故在大门前左右两边各立一根旗杆,以炫耀其权势。旗杆根部嵌入石墩,耸立数丈,高出房顶。王家还高价特请知名工匠打造了两只锡质斗,悬挂旗杆中上部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刁刁熠熠发光,炫人眼目,赢得无限仰慕慨叹。

每逢喜庆节日,王家便在刁刁旗杆上悬挂锦旗,吸引群众围观,可谓“独一无二、无人可及”。

如今,单县“三绝”仅存张家牌坊,与百寿坊(俗称朱家牌坊)被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成为单县闻名旅游打卡地。

文/图 刘厚珉



李村营位于郓城县西北方向,距原郓城县城约30千米,北距黄河约2.5千米,村西是沿黄公路,距镇政府驻地约1.5千米,战略位置十分突出。

明朝洪武年间(1368-1398年),李氏祖李东由山西省洪洞县移民到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城西约6千米的李村居住。明朝万历年间(1573-1619年),五世祖二支李实迁到此地定居,当时的村名为白家垓,后来白姓人家全部迁徙到外地,只留了一个营园子(围墙),遂改村名为李村营。从此,几百年过去了,历经多次黄河水患,数次匪霸骚扰,李村营村名未改,村址未变。

清朝末期至1946年属寿张县。1947年归郓北县十区,1949年划归郓城县十区,1952年属十四区。1958年初归李集乡。同年秋建李村营大队,属李集公社。1984年初改为李村营村民委员会,属李集镇。

李村营是开国上将杨勇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。

1939年3月2日,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鲁西南,其中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带领团部和警卫连100余人进驻李村营。

当时的李村营有130多户,600多口人,没有外姓,没有匪霸,群众基础好,是抗日模范村。村长叫李曰雅,是一个热情诚实的庄稼汉子。他组织少年儿童为部队站岗放哨,挨家挨户通知,不要到村外来亲访友,以免走漏消息。因部队的战士都是外地人,怕外出因口音引起怀疑,他每天领着可靠的本家兄弟给八路军买粮买菜和生活必需品。有时,为了买到新鲜的蔬菜,要连续跑几个村庄十几里路。晚上组织妇女为八路军蒸馍、烙饼,携带针线做军鞋,缝衣缝被洗衣服。共做了500多双军鞋,所有干部战士每人两双单鞋、两双棉鞋。

李月典,是李村营的一位开明绅士,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,在当时的郓城县有较高的知名度。因为做生意,他和当时汉奸县长刘本功是“拜把子”兄弟。他主动找到杨勇,决定为杨勇部队采购军需品,为抗日作贡献。由于敌人的封锁,当时的军用物资非常紧缺。小到食盐、布匹、毛巾、肥皂,大到枪支弹药,只要八路军需要,李月典都能如期运到八路军手里。

杨勇曾经说过,一个曰雅,一个月典,一个左膀,一个右臂,一个主内,一个主外,缺一不可,都是我的好兄弟,都是八路军的恩人。

一次,八路军得到情报,日伪军组织2000多人到沿黄乡村去“扫荡”三天,其中就包括李村营,杨勇将团部和警卫连紧急疏散转移。李月典带领杨勇和几个警卫员来到郓城西关。城门外的于河瑞和李月典是朋友,是抗日模范户,于河瑞的大儿子是八路军战士。李月典将警卫员安置在于河瑞家随时准备接应,和杨勇大摇大摆走进城里,直接来到汉奸县长刘本功家里,李月典对刘本功的姨太太介绍说杨勇是南方来的大客商,找县长要做大生意。刘本功的姨太太不敢怠慢,急忙安排人陪同,每天大鱼大肉伺候着,直到第4天刘本功“扫荡”回来,还在家里安排酒席,招待“拜把子”兄弟李月典和“南方大客商”杨勇。1946年刘本功被枪决,到死他也没想到当年他盛情招待的“南方大客商”就是以后闻名华夏大地的开国将军。

虽然当年征战的硝烟早已散去,但80多年前的拥军爱民的情景,却犹在眼前。如今的李村营的群众如将军所愿,过上了幸福安康的新生活。

魏建国

